

#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 ——评“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徽州文化》

■ 翟屯建

《徽州文化》是“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一，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九章，辅以前言、结语与后记，体例周密、结构严谨，字里行间不见空泛议论，唯有坐标可考、时空可溯、文献可按、田野可验的扎实表达。尤为可贵的是，它虽隶属“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列，定位为社科普及读物，却始终坚持以专业史学的标准自我要求。不降格以通俗，不炫技以取宠，不拔高以造势，而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学术诚实，将徽州从被浪漫化、符号化、碎片化的文化想象中打捞出来，还原为一个有山川肌理、有制度脉络、有人间烟火、有文书证据的活态文明实体。

作者刘伯山自上世纪90年代起，持续深入徽州腹地，足迹遍及近千个自然村落，抢救性收集、整理、归户徽州文书数万件，其中大量为首次面世的一手契约、账簿、阅书、讼案、谱牒、碑刻与日用类书。这些沉睡于农家阁楼、祠堂夹壁、旧书摊贩中的纸片，并未被当作猎奇的“古董”陈列，而是成为贯穿全书的知识底座与论证支点。书中谈重教，引《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细数其公产拨款如何用于束脩、膏火、赴试盘缠；论崇文，援引明嘉靖《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与清人程瑶田《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揭示“文献之邦”不仅是美称，更是士绅阶层主动建构的文化自觉；述乡约，取嘉靖五年祁门彭龙村《申明乡约碑》，逐条解析其春秋社祭、会饮谈约、善恶登籍、约正推选等运作机制，使六百年前乡村自治的理性逻辑跃然纸上。

这种“以文书证制度，以田野释文本”的方法，使全书规避了地方史写作常见的两种陷阱：一是纯文献考据的隔膜感，只见文字不见人；二是纯口述采集的主观性，只见情绪不见结构。《徽州文化》所呈现的徽州，是契约上签押的指纹、碑阴镌刻的姓名、谱牒中反复誊抄的迁徙路线、塌垣圯址旁标注的水文数据，是无数普通人面对贫瘠山地、苛重赋役、宗族压力时所作出的筹划与调适。

在叙事结构上，《徽州文化》摆脱传统地方志“朝代更迭—人物庐列—风物罗列”的窠臼，构建起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三层空间叠合”文化地理学框架。这一框架不是先验的理论模型，而是从徽州自身历史实践中自然结晶而出的认知地图。第一层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徽州文化圈”，即一府六县（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的行政与文化原生地；第二层是动态扩散的“徽州文化辐射圈”，涵盖皖南、浙西、赣东北毗邻诸县，其间谱牒常载“自歙迁来”，水利技术互通，方言词汇共融；第三层则是跨区域流动的“徽州文化影响区”，远至北京、苏州、扬州、汉口乃至日本长崎，皆可见徽商营建的会馆、徽匠雕琢的建筑、徽籍医者编纂的方书、徽州书坊刊刻的典籍。此类空间传导链条，绝非泛泛而谈的“影响深远”，而是通过碑刻题名、迁徙记录、营建契约、账簿明细——锚定，使文化的扩散成为可追踪、可计量、可复原的社会过程。由此，徽州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文化盆景”，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文化河流，其源头活水在六县山谷，主干流经江南腹地，支流则蜿蜒至全国乃至东亚海域。

书中对徽州文化本质的再界定，展现出极强的思想穿透力。第九章提出的四重性质判断，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全书最具锋芒的理论内核。其一，徽州是中国汉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承的突出代表。此说有力矫正了长期笼罩徽州研究的“商人中心论”。书中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徽州塌垣”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歙县梯田茶园系统”为实证，指出徽州社会的根基在于“山—田—村”三位一体的精耕细作体系，徽商资本实为山地农耕经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溢转化，而非无本之木。其二，徽州是传统中原文化自我发展的经典案例。作者强调永嘉南渡后中原士族“反客为主”的文化主体性，他们通过联姻、科举、建学、修谱等系统性工程，将礼制、理学、宗法深度植入徽州社会肌理，使其成为中原文化南迁后最完整、最自觉、最具创造性的延续形态，而非简单的“文化混血”。其三，徽州是南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缩影。宋元至清中叶，正是帝制中国国家治理、宗族组织、民间教化趋于成熟的高峰期，而徽州恰好完整保存了“国家—宗族—家庭”的三级治理结构。其四，徽州更是中国传统乡村民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展现。这是全书最具人文温度的判断，作者刻意剥离精英主义滤镜，将目光投向普通徽州人。萧江氏祠规中“虽佃仆、佣赁之人，亦必一体待之”的平等意识，彭龙乡约碑上“喜庆相贺，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伦理，乃至塌垣公约中“轮值守塌，均摊修费”的集体理性，无不昭示着徽州文化辉煌表象之下，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基于生存智慧、伦理自觉与社区认

同所进行的日常实践。这种“人民性”的确认，使徽州文化真正从圣贤书架上走下来，回归于泥土地。

在表达风格上，《徽州文化》践行了一种极为珍贵的学术克制。全书杜绝“璀璨明珠”“精神家园”之类空洞修饰，对朱熹、戴震、邵作舟、胡适、陶行知等巨匠，亦不作概念化颂扬，而聚焦其思想如何被徽州人实际践行。朱子《家礼》如何转化为祠堂祭仪流程？戴震朴学如何渗透进族谱编纂体例？邵作舟如何是徽州学术近代转型的枢纽性人物？胡适白话文理念如何影响本地启蒙读物？这种“去光环化”的处理，使历史人物回归具体土壤，避免了英雄史观的单薄。数据运用同样一丝不苟：新安医家占安徽医家总数70%，出处为2023年《中医大辞典》第3版；徽商“足迹遍天下”，依据为万历《休宁县志》与《歙志》原文；现存徽州典籍，坦承《徽州文献总录》著录6000种，而据作者目验当超8000部，并说明存疑之处尚待考证。53幅插图、十余张附表，全部服务于核心论点。

《徽州文化》的价值，远不止于提供一部关于徽州的权威读本，它更树立了一种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范式。以空间为尺度，以文书为证源，以田野为现场，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以平实语言承载厚重思想。它告诉读者：徽州为何是徽州？因其山川形胜孕育出坚韧的农耕理性。它走到今天，靠一代代普通人在契约中立信、在碑石上铭约、在谱牒里续根。它的根须深扎于中原士族南迁带来的文化基因土壤，更是徽州人面对现实所做出的务实选择。

## 当我们谈起精神故乡

——《尽百家之美——明清散文选析》编辑手记

张慧 朱天心

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常思索读书的意义。书在茫然时为我们点一盏灯，在喧嚣中替我们开一扇窗，在转瞬即逝的时光里为我们保存一片可随时归返的故乡。读书，从来不是简单的消遣，而是一场精神的跋涉、一次心灵的认领。

年少读的几本好书，几篇好文章，会影响人一辈子，这被无数人的生命阅读经历证明了，它指向一种跨越时空的“遇见”——在偶然中注定遇见，在他人闲置的旧书堆里，遇见自己一生的精神底色。

《尽百家之美——明清散文选析》正是这样一场“遇见”。它初版于1981年，茅盾先生在病中两次为其题签，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在那个书籍珍贵的年代，这样一本选本，或许也曾躺在某位乡村教师的案头，被某个少年在煤油灯下摩挲翻阅。书页间，宋濂的典正、张岱的性灵、顾炎武的沉郁，归有光的温情，如涓涓细流，渗入少年懵懂的心灵。44年后，92岁的方铭教授携弟子李传玺、潘军、师生三人合力将这本文书修订、增补、再版。这是一场漫长而郑重的接力。初版读者或许已生华发，但那些曾被文字照亮的时刻、那些字里行间构建起的审美与思想，依然鲜活。

新版定名“尽百家之美”，意蕴深远。它既是数十位明清散文大家六十余篇作品的精心荟萃，涵盖游记、随笔、政论、书信等；又是一种对多元风格的欣赏、对不同声音的倾听、对那个时代文人风骨与情致的全景式观照。品读这些文章，我们是在学习古文，更是在贴近一个个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命。他们的忧思与旷达、坚守与洒脱，穿越数百年烟尘，叩击今人心扉。

最动人的，莫过于本书背后的“师生共传”。方铭教授年逾九旬，仍主持修订；弟子李传玺增补评析；作家、画家潘军，则以画意映衬文心。这一合作，是学问、品位与情怀借由出版完成的一次衣钵相传。细细想来，乡村教师存留的“古时候的课本”，何尝不是一种无名的传递？每一本流传下来的好书，都凝结着前人的眼光、选择与心血，它们默默等待，在某个时刻，点亮另一双眼睛。

对我们而言，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其实是在搭建一座桥。桥的那头，是明清文人雅洁深沉的笔墨世界；桥的这头，是当下在碎片信息中浮沉、渴望内心安顿的我们。书中的每一条注释、每一段评析、每一幅插图，都让这座桥更稳固、更亲切。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书中后记引用的这句词，是编者与读者之间无声的共勉。美好的文字与思想，如同天边晚照，值得我们举起回忆的酒杯，劝它慢慢走，让它多留驻。愿《尽百家之美——明清散文选析》，能够成为我们书架上的“古时候的课本”——在某个我们需要沉静、深度和对话的时刻，它就在那里，等待与我们相遇，带我们重返那片精神故乡。



## 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

■ 康富强

近年来，从“矿工诗人”陈年喜的《炸裂志》，到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再到农民工“安大爷”重写1957年高考作文题《我的母亲》引爆网络，一位又一位来自基层的写作者闯入公众视野。这些现象并非孤立的文学事件，而是“新大众文艺”浪潮的生动注脚。我们如何站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脉络中审视这一现象？

### 从“文艺大众化”到“新大众文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我们的文艺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农兵的。这一论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八十多年后，当“新大众文艺”进入公众视野，我们看到的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脉络的自然延伸。至少可以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其清晰的演变轨迹。

第一，文艺对象的扩展。《讲话》中界定的人民大众，今天已拓展至新时代社会各阶层群体。“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以生活为根，以真情为魂，以大众为本”。

第二，文艺内容的丰富，从革命建设生活延伸到新时代日常生活的全景呈现。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工农兵，今天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则将镜头对准了外卖员、快递员、卡车司机、工厂工人等群体的日常生活。范雨素笔下在北京做家政的经历，王计兵诗中“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的吟唱，河南濮阳农民工刘诗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安大爷”重写1957年高考作文题《我的母亲》——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幅新时代人民生活的生动画卷。

第三，文艺形式的革新，从传统媒介影响下的艺术形式革新到数字传播多元融合下的文艺形式。延安时期开启的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小说、快板、

话本、说书、连环画、戏曲等。而在今天，新的传播媒介深刻改变了文艺的形态。网络小说、有声书、非虚构写作大赛、短视频平台上的诗歌朗诵等，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将生活的酸甜苦辣凝练成传达新时代人民心声的故事。

### 素人写作的发生与发展

素人写作的现象并非凭空而来。从2017年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引发“10万+”点击，到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相继出版，再到农民工“安大爷”的《我的母亲》48小时内点赞量突破500万，素人写作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

在这些文化现象背后，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力是普通人对新传播媒介的掌握与使用。江苏外卖员王计兵道出了这种变化的意义：“以前觉得主流媒体、传统刊物的内容创作带有门槛，我们‘草根’难以被看见；现在有了互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浙江理发店店主颜怡选的经历亦颇有代表性。在传统文学领域，他得到省作协的指导；在新媒体领域，借助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影响力，他创作的《我是剃头匠》获得“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

媒介的变化不仅降低了发表的门槛，更重要的是让作为文艺生产主体的人民大众真正显现了出来。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文学小组，每周六晚上都会亮起温暖的灯光，工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分享作品。黄土坡里走出的家政女工李文丽在这里找到创作的信心：“大家坐在一起很自在，你说的内容没有绝对对错，也没有人会批判你。”

通过素人写作，新时代各行各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得以呈现。陈慧在菜市场观察“命运的称重计价”，小海写下《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表达对生活的思考，“矿工诗人”陈年喜感受心脏“爆裂的巨响”——这些扎根生活的文字，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素人写作的意义

素人写作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文类，是一种能将内容与形式发挥得相得益彰的重要艺术形式。其深远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

首先，素人写作实现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统一。在传统的文艺生产模式中，创作者与表现对象是有一定距离的。而素人写作中，创作者本身就是故事主角。家政工写家政，外卖员写外卖——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创作方式，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品质。

其次，素人写作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原则。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素人写作者本身就生活在人民之中，他们不需要“深入”，因为他们就在生活的深处。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诗句，陈慧在菜场的鱼腥味中观察人生——这种“在场”的写作，使作品具有专业作家难以企及的生活质感。

再次，素人写作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在东莞，36名素人写作者入选“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赴京学习；在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正式出版——这些事例共同表明，“新大众文艺”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家园”。

素人写作的发展也面临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从“现象热潮”发展为“可持续生态”？如何在保持“接地气”的同时提升艺术水准？如何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平衡？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但无论如何，素人写作的兴起已经证明：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拿起笔书写自己的生活，文艺便获得了最深厚的土壤和最蓬勃的生命力。

从延安窑洞里走出的“文艺大众化”，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这条穿越八十多年的脉络，见证了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而素人写作，正是这条脉络上最新绽放的一枝新绿——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时代的先声。

古有徽班进京，今有“百戏入皖”。自2025年9月以来，“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以令人瞩目的社会热度与经济效益，超越单纯的戏曲展演或汇演，成为一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重构戏曲文化内涵、助推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展现“场景化的新时代”的文化实践，为戏剧艺术乃至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份“安徽答卷”。

“百戏入皖·星耀合肥”跳出以往“文旅融合”的简单拼贴，初步构建起以戏曲文化为中介，联通上下内外、提升城市魅力、赋能社会发展的创新模式。特点有三：

其一，在文化统筹上，它是一场“顶层设计+文化传播+在地转化”的系统工程。活动并非零散的剧目引进，而是由政府主导，联动文联、剧协、剧院、院团及社会力量，设定清晰的“两个百亿”目标，有计划地将全国戏曲精华精准导入，有组织地将本土地方戏曲普及推介，既打破了剧种的地域局限，又有力推动传统戏曲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一张戏票就是一张“文化通行证”，让戏曲真正从舞台艺术转化为百姓切身可感的城市文化气息。通过与上海、西安等城市开展“双城记”戏曲互荐，合肥向全国展示了其超越“科创名城”单一定位的多元文化魅力，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科创硬实力的交融互补。

其二，在运营模式上，探索出“政策激励+戏曲引流+市场反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10元、20元、30元的惠民票价，是一把降低高雅艺术门槛、培育潜在观众的“钥匙”。戏曲文化资源一旦与旅游、商业、制造等进行整合，就成为赋能城市更新、驱动产业融合的“活性文化资本”，其核心创新在于衍生的“票根经济”，票根可享受跨行业的消费优惠。据统计，累计激活票根权益的戏迷票友超3万人次，促进消费超4亿元，其中超2.7万人次凭票根免费畅游安徽标志性景点。这充分证明，优质文化内容本身就是强大的流量引擎和消费动力，一张戏票就是一块“文化芯片”，戏曲文化完全能够在拉动经济与激活产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晚上看戏，白天赏景”的文旅新模式，有利于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产业闭环，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的互动共赢。

其三，在受众拓展和素养提升上，铺设了“名家引领+大众共享”的普及提高路径。一方面，遴选70位戏曲名家领衔出演，通过“以角带戏、以角引流”，为大众文艺树立艺术标杆，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戏曲进社区、进校园等多元渠道，实现戏曲文化普及和文明素养提升。双管齐下，亲民惠民，既满足了中老年戏迷群体的审美期待，更吸引了40岁以下青年观众（占比75.1%）的热情参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戏曲观众“老龄化”的刻板印象，为戏剧行业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火热开局后，如何将一时的消费“流量”转化为长期滋养城市的文化“留量”？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设立专项基金、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及评价机制等，以确保文化与经济联动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票根经济”打开了消费入口，但围绕戏曲IP的产业链条仍显单薄。在主题文创、数字内容、沉浸式戏剧、研学教育等衍生业态开发上，还存在巨大潜力亟待挖掘。更紧要的是，安徽借此活动搭建起全国性的戏剧展示和交流平台，如何让不同剧种、流派艺术家之间进行深度碰撞，尤其是如何激活安徽本土黄梅戏、徽剧等剧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推动各剧种的本体建设，创作出更多“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戏剧精品，是下一步要深思和解决的命题。

当戏曲的鼓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创新的新路径、新风貌和新气象。“百戏入皖·星耀合肥”的实践证明，戏曲文化绝非经济发展的点缀品，而是可以成为助推经济、驱动创新、点亮城市、温暖人心的核心动能，它提供的不仅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更是一种充满文化自信的“发展观”。

## 『百戏入皖』，戏曲文化赋能的创新探索

■ 江飞